

■蜜蜂寓言

# 小心翼翼说出自己观点

◎苏小和  
财经作家,现居北京

我越来越意识到方法的重要性,我的意思是说,在方法和观点的选择中,我们应该重点思考方法,而把观点的陈列放在非主流的位置上。当我们提出某种观点,之前应该就这个观点背后的方法论进行必要的审视:我们依据的是哪种既定的方法体系,这样的方法体系是建构在哪些客观信息之上。如此,我们便可以在必要的理性基础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合理的判断。

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生活的吊诡显露无疑!我们总是看到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出他们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在另外一个思维范式下,却是彻头彻尾的对常识的违背。情势继续发展下去,这些违背常识的观点,之前应该就这个观点背后的方法论进行必要的审视:我们依据的是哪种既定的方法体系,这样的方法体系是建构在哪些客观信息之上。如此,我们便可以在必要的理性基础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合理的判断。

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生活的吊诡显露无疑!我们总是看到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出他们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在另外一个思维范式下,却是彻头彻尾的对常识的违背。情势继续发展下去,这些违背常识的观点,之前应该就这个观点背后的方法论进行必要的审视:我们依据的是哪种既定的方法体系,这样的方法体系是建构在哪些客观信息之上。如此,我们便可以在必要的理性基础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合理的判断。

■买房者说

## 究竟该谁优先,该谁重点

◎章剑锋  
厦门大学  
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香港财经文摘杂志高级记者  
专栏作者

即便是常识,也往往容易在某种混乱的语境里遭到背离。虽然政府公布了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解决方案,但是没有能够促进混乱语境的正向回归,反而招来更加激烈的辩论。人们通常纠结于这样一些细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既然有了解决办法,那些支付能力不足的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就不解决了吗?是应该将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一并拿来解决,还是只想简单地将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权益保护起来,而打算将中等收入群体推向残酷冷血的市场,不再过问?

人人都享有住房权益,这是发起讨论的基本价值前提。吃低保的困难户需要基本住房加以维系,获得起码的人格尊严,但这同时并不意味着,能够支配相当多财富的另一群体(富人)就不需要住房权益。我们的目标,是要确保每个人都能住上合适的、体面的房子,不存在抛弃一部分,保护一部分的割裂,也不应该将某个社会阶层片面割裂出来予以单独关照。

只是能够理解,在赋予人人住房权益的过程之中,必然存在个先后的次序。按照某种传统惯例,如果要实行排队制,谁的问题应该优先受到重视和解决?这会是无可回避的题目,恐怕也是引

■彼岸

## 早产民主选举带给伊拉克更大危害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在美国保守派阵营中,当初大多数人支持布什的伊拉克战略,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批评布什在伊战后的政策,“夹生民主选举”则是最大的饱受攻击的错误之一——伊拉克比美国参与率还高的选举投票曾是布什引为自豪的事。几位重要的美国保守派思想家,包括哈佛研究所的托马斯·索维尔在内的学者都逐渐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早产的民主选举给伊拉克人带来了更大的危害。他们认为民主选举应该有思想自由的基础,而伊拉克的选举并没有这样的基础,因此民主选举给伊拉克带来的坏处大于好处,它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伊拉克的混乱局面。

在伊拉克的民主选举中,几乎所有的伊拉克人都按照自己的宗教派别投票,什叶派伊拉克人投什叶派候选人的票,他们就觉得自己派别的候选人会照顾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觉得那样的投票也是顺从自己的宗教信仰,妻子完全按照丈夫的指令去投票,那也是伊斯兰宗

的价值理念缺失,我们还谈到晋商兴起与消亡的基本特征,以及当下中国企业的历史宿命。我清楚记得梁先生的一系列真话带给我的震撼,但此时,当我在课堂里连续听了两天课后,一种对方法的怀疑却从心中升起。显然,梁先生的观点很符合我的心意,他关于制度的思考,对当下经济形势的判断,我都无条件认同,但同时我也发现,梁先生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却在用一种绝对否定的方法,对他人的观点作了不容怀疑的否定。我甚至相信梁先生在阐述他的观点时,或多或少在援引文革时代的方法,比如粗暴的判断,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对某种人群的歧视等等。虽然我知道在观点的层面上梁先生对这样的形态是极度鄙视的,但在方法论的层面,先生却有可能与上述观点出自同一个家门。

我在怀疑几个层次的现象。首先,当我掌握了一种常识之后,我是否就同时拥有了简单否定其他观点的权力?其次,我所认同的常识(包括某种学术体系)是否建立在更普遍的常识之上,或者说我所依赖的常识,是否成为真正的常识,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复制或繁衍一个基本的错误而我们却浑然不知?第三,我们依靠什么具体的思维流程推演出观点,这个流程有没有可以进一步细分的方法特征?

一个必要的姿态由此提出:我们必须要学会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说下去,也许一切观点都不重要,

也许观点仅仅具有个体意义,也许这个世界根本就不需要观点,我们毕生想获取的,应该是方法,观点最多算是方法之下的副产品。相信明白了这个道理,一些基本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比如我20岁时观看一场体育比赛,那理理所当然地把它看成是一场爱国主义表演,其中的激扬情绪具有无限多的普遍性,以至于这样的情绪具有绝对正确的地位。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同学在众人都在电视机前被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感动得热泪乱流的时候居然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教室里读小说,我理所当然批判他的不爱国行为。我想当时的真理应该是在我的手上,我所掌握的爱国主义情绪具有否定一切的功能。

多年以后,我问自己,在爱国主义和一本具体的小说之间,我究竟应该怎样选择。我以为这样的问题具有巨大的价值;它提醒我,当年的观点已经毫无价值,而背后的思维方法却绵延不绝,渐渐让一个具体的人格健全。

可惜,这样对自我的审问拖延了将近20年,让一个具体的人徒然耗费了太多的时光。有位学人说过,我们是喂“狼奶”长大的孩子。对这句话的具体解释似乎也能推延到我方法的审视之上。我们所学到的所谓观点恐怕是有问题的,而这些观点背后的方法,其荒谬程度可能更甚。因此,当我们试图说出某个观点时,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具有足够宽阔的视野?而我们对自我的怀疑能力是否足够我们提出某种价值判断。

收入者则要相应后置。

但这时候如果要较真,人们还可以发现,那种在市场面前一分钱也掏不出来的零支付能力者(即穷人)毕竟不多,要解决这少数人的住房问题,一旦决心去做便不是难事,只是解决了这少数还不够(否则便有偷鸡嫌疑)。真正的难题是占社会总人口相当比例的低等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如何解决,是谓“夹心层”难题。有理由相信,这个层面处于极尴尬的位置。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怎么办?住房问题的最难点和最关键就在这里。

这时候被讨论的所谓优先,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物理排序,更为实质的语境应该是,重点解决谁的住房问题。说到优先,这有共识,先简后繁、先易后难,当然是要优先解决穷人的住房;说到重点,没有共识,但愚下以为,必定包括低等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者在内。

调控者要快一点界定好低收入群体的构成与分类,再细致耐心地做出一个与之逐一对应的执行时间表。在未经拆解的、语境含混的所谓“低收入群体”一词的抽象指向下,只简单地抛出一个解决方案,既不够,也行不通。到时候工作不好做,地方上怕是要统统交白卷。

泓泓争吵声中,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也许是个伪命题,也许是个真命题,但不会是一个好命题。因为它极易使人背离常识,争执于谁先谁后,谁应该被重点关照,谁又应该被排除出局。这争执逸出来的气息在暗示,参与争执的人们心里是多么缺少依附感,他们害怕被住房解决方案抛弃,成为不被惦记的人。

教的要求。因此,这样的民主选举完全没有独立思考 and 自由思想作为基础。如此民主选举当然让什叶派伊拉克人得到更多的实惠,因为什叶派人占了伊拉克60%的选票,你怎么能期望这样的民主制度对所有国民做到平等、公正?

虽然今天伊拉克的许多问题都与“夹生”的民主选举有关,但从另一方面说,伊拉克的民主制度给了下一步思想自由创造了条件,只是伊拉克人为此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当年萨达姆的专制下不允许有思想自由,所有报纸都得听萨达姆的指示。今天的伊拉克有几百家独立的报纸,作者可以在那些报纸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读者也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家报纸。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当今的伊拉克有了一个相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环境,伊拉克人要获得真正的思想自由,仍然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们需要突破宗教和传统的禁锢,需要自我的思想解放。

有一种说法,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具备了民主制度的条件,从生活标准去衡量民主制度的条件有一定的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国民的思想自由与独立思考的程度,因为那才是民主制度的基础。索维尔在他的写作中举例说,早在英国的民主选举前,英国就已经是一



泸沽湖:“东方母系文化家园的最后一朵红玫瑰”

■一叶知秋

## 社会和谐因子就在传统习俗中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高明华  
北京师范大学  
公司治理与企业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导

9月下旬,笔者有幸参加了北京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云南研修班,先是倾听了云南省相关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关于云南省民族和谐的介绍,而后去考察。云南省的GDP不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都处于全国倒数的位置,然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大省,“穷”并没有妨碍云南省实现社会和谐和民族和谐,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习俗是一种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但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际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云南省少数民族尽管也有不少汉化的成分,但其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甚至一些与国家法律相违背的民族习俗,也仍被允许存在着,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去干涉。

有效的习俗是具有经济功能的,最主要的经济功能有两种:一是可以节约信息费用,习俗是人们的共识,不需要搜集很多的信息便可实现某种交易,而违背这种习俗则会遭众人“唾弃”。二是可以减少法律和法院的强制执行费用。人们在按某种习俗行事的时候,法律和法院的作用往往是微不足道的。

摩梭人至今保留着“走婚”习俗,这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夫一

妻”的法律制度可以说是相悖的。然而,这种习俗不合法却合理,起码到目前,这种婚俗是构成民族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经济学角度,合理的即是收益大于成本的。就成本来说,摩梭人的“走婚”及与其相适应的家庭关系,几乎没有多少可称得上是成本的因素。维系婚姻所需的信息费用看,“走婚”是以道德和感情为基础的,并非外界所宣扬的那般随便。在经济学上,婚姻也是一种交易关系,既然摩梭人的婚姻以道德和感情为基础,双方或任何一方便不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欺瞒对方而另寻异性配偶。由于摩梭人基本上围绕泸沽湖畔而居,且人口不多,如果出现欺瞒,玩弄花言巧语,游手好闲,则很容易被他人知晓,从而遭到道德上的谴责,从此抬不起头来。这对于一个成年摩梭人来说,是很划不来的。

因此,他们会循规蹈矩,维护既成的婚姻关系,除非感情破裂。在这里,为维护婚姻关系而付出的信息费用,如监督费用,聆听等费用非常低。从法律和法院的强制执行费用看,“走婚”,也即所谓男不娶,女不嫁,家庭成员都是母系血缘的亲人,财产按母系继承,家庭成员的血统完全以母系计算,家里没有翁婿、婆媳、妯娌、姑嫂、叔侄等关系。在母系家庭中,既没有财产纠纷,也没有情杀、家庭暴力、离婚、寡妇、子女无人抚养、流浪儿等社会问题,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有人统计过,泸沽湖沿岸的自然村,从1949年到现在,只有1人犯过盗窃罪,没有人犯过重罪。摩梭人如此之少,又没有各种纠纷,法律和法院的强制执行费用也就谈不上

了,或者说,是相当的。不过,在“走婚”尚未公开阶段(生育子女之前),由于男子需要暮来晨去,还要经历各种“关卡”,因此这些男子异常辛苦,这可算得上是一种成本支出吧。

然而,相对于“走婚”的成本,其收益却是非常明显和巨大的。

一是男女平等,分工合理。摩梭人家庭有“舅掌礼仪母掌财”之说,家庭财产的保管使用、生产生活安排、一般家务及接待宾客都由母亲或家庭中聪明能干有威望的妇女做主;而家庭的喜庆庆典,较大的交换或买卖,除婚姻爱情以外的社会交往,则由舅舅或其他有能力的男性成员做主,这种明确而几无僭越的男女分工无疑是摩梭人实现安定团结和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是家庭和睦,互敬互爱,崇尚集体主义。由于摩梭人家庭成员都是同一母系血缘,因此具有崇尚母亲和集体主义观念。家庭成员亲切和睦,尊老爱幼、礼让为先,宽怀谦恭,女子温柔多情,男子豪爽重义,孩子们有欢乐的童年,老人们有安逸的晚年,社会和谐而稳定,无怪乎人们赞叹泸沽湖是“东方母系文化家园的最后一朵红玫瑰”。

需要注意的是,“走婚”是基于特定的民族和环境条件的,脱离这些条件,“走婚”的成本必然会大幅度提高。而在这些条件下,既然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尤其是能够实现社会和谐和民族和谐,就应当予以保护,任何有违法行为为由而横加干涉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在这方面,云南省的做法值得称道。

■一个人的宇宙

## 好用型设计:最简单要求最难过关

◎朱近野  
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世上有一种人过不去的别扭设计。例如我最近见到的一个浴室调节阀,热水和冷水由两个并排的旋钮控制,特异的是,热水旋钮转到最右,即是热水流量全开,冷水旋钮转到最右,则是冷水流量全关。难道厂家的思维方式是:两个旋钮都转到最右,代表最热,反之则是最冷?

造出这一类产品的人,恨不得把操作手册就放在产品上边。因此设计学专家唐纳德·A·诺曼在《设计心理学》里,对他们很很嘲笑了一通。不过,诺曼对一款电脑软件Visicalc的好评有加。Visicalc其实是1979年上市的老古董,界面简陋,程序大小也只有几十KB,功能大体上是现在的Excel一路,早就没人再用。话虽如此,Visicalc的江湖地位却是至高无上,号称“从此PC不是玩具,而是正经工具”。

Visicalc跟今日巨头微软的早期产品BASIC编程软件不同,开发者没有拿它卖给IBM这样的大公司当作销售渠道,而是冒险吃螃蟹,选了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的途径,这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与同期的其他软件相比,Visicalc的使用方法也让人耳目一新,诺曼赞赏道:“它让用户感觉到自己在直接地处理问题,而不是在操作一部机器。”

这个评价看起来简单,实则非常难得。就算今天技术突飞猛进,电脑的用户界面比当年要友好了无数倍,但随着技术对生活的深度渗透,人们对“直接处理问题”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过关。有两个例子,提起来不免让人觉得可惜。即是“时间管理”和“思维导

图”软件。

所谓时间管理,大意是说要利用个人电脑或是PDA等便携装置来“数字化管理”人们的日程表,这种软件的优点是记载项目更清晰,规范,记得更多,不会搞混,一旦计划赶上不上变化,还能够灵活调节。有一款时间管理软件的说明这样写:“……实际上是在通过一种隐蔽而有效的心理机制促使使用者克服拖延、浪费、忘事、主次不分、顾此失彼等不良习惯,帮助您掌握正确的时间管理方法,使您的工作与学习更有成效,有更多的时间享受闲适与亲情……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自动安排日程,日程安排精确到每半小时。任何时刻,您都不会觉得无事可干”。

“思维导图”被称为“学习工具”和“思考工具”,它的功用,是“基于人脑具有的产生连接与联想的功能,用导图的形式把信息按关联程度储存,已经被全世界许多人作为创造性思维工具应用在生活中各个方面,包括合作战略开发、行为分析与评估、信息表达与比较、思路收集等等。”使用一个叫做Personal Brain的思维导图软件,你还可以把随机工具,而是冒险吃螃蟹,选了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的途径,这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与同期的其他软件相比,Visicalc的使用方法也让人耳目一新,诺曼赞赏道:“它让用户感觉到自己在直接地处理问题,而不是在操作一部机器。”

看起来又有趣,又强大。但这两种软件的普及现状都不很妙。先说“时间管理”软件,几乎每一个手机上都有个简化但基本够用的日程表功能,更不用说装上Windows Mobile或是Symbian系统的智能手机待机画面上就有一栏写着你今天还有几件待完成的任务。可是真的天天用到这些功能的人,我还无缘结识几位。目前的时间管理软件能够让使用者自己

翻屏寻找哪里有空档可以插进新的计划,却不会直接弹出个对话框问你要替换掉哪一个预定项目,也不会原定的出行被取消后自动问你要把什么计划提前来办。哪怕你觉得手工调整也可接受,对不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得逐个删除、添加、删除、添加。倘若事事按部就班,光靠头脑也应付得来,何苦在小小机器上按那么多键呢?

“思维导图”软件在中国的命运更加不佳。虽然网上一搜,能见到许多热心用户撰写的推广文章,也可以见到不少收费培训班,但能够找到的实际例子,却往往是像学生听课所作的笔记一概,把一本书、一篇文章的主题和概念大小成套。不知各位读者的经验如何,拿我来说,倘若白纸黑字地下主题,头脑就变得笨拙无比,再怎么用力,也只是把思维在语义层面上拆来组去,想不出新鲜花样。反倒是轻松地吃零食、或是等待睡着的片刻里,潜藏在头脑里的印象会浮出水面,变化为各种形状,说不定就恰好碰上等待解决的问题。“思维导图”软件本来号称应用放射结构来模拟自然思维,要抓住天马行空的想法,但硬是被用成了一二三四条框框的笔记工具。

“思维导图”方法的创始人东尼·博赞说:“买电脑、汽车等都会有很厚的说明书,而人的大脑——这部全世界最有深度和力量的机器却没有说明书。我就是想要有这样一本书。”我想,“时间管理”和“思维导图”软件这两种本应很有用的工具成为屠龙之技,也许就是因为它们要给大脑也配上厚厚的说明书。

所谓“好用型设计”,借一个成语“如臂使指”来描述正合适,顺其自然,才能因势利导。倘若一项工具是要帮助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最好还是先认真学习一下我们本来是怎样干的。